

ELUOSI YUANDONG DE
ZHONGGUOREN

俄罗斯远东的 中国人



Ф.В.索洛维约夫 В.В.格拉韦 / 著 王晶 张宗海 / 译 宋嗣喜 赵立枝 / 校

俄罗斯远东的 中国人



Ф.В.索洛维约夫 В.В.格拉韦 / 著 王晶 张宗海 / 译 宋嗣喜 赵立枝 / 校

译者说明

本书是由两个独立的文稿合编而成的。一个是《资本主义时代旅俄华工在远东》(1861 - 1917),另一个是《阿穆尔沿岸地区的中国人》(1881 - 1917)。《资本主义时代旅俄华工在远东》(1861 - 1917) ф. В. 索洛维约夫是俄罗斯远东资深学者、历史学博士。他终生致力于 19 世纪末至 20 世纪初俄国远东华人问题的研究,著有《华工及其在滨海地区的地理名称》(符拉迪沃斯托克,1973 年)、《苏联远东的中国地理名称辞典》(符拉迪沃斯托克,1975 年)等。本书是他的代表作,也是其遗著,1989 年莫斯科《科学》出版社出版。

肥沃而辽阔的黑龙江流域是中国人世代居住的地方。汉族、满族、鄂伦春、赫哲等民族在这里生息繁衍。此外还有成千上万的流民从山东、河北、山西和东北等地来到这里,从事农耕、采金、挖参、打猎等生产活动。他们春来冬归,经年不断,是当时的季节性移民。然而,19 世纪中叶,沙皇俄国在进行了一系列侵略活动之后,趁第二次鸦片战争之机,强迫清政府先后签订了不平等的《璦琿条约》和《北京条约》,将外兴安岭以南、黑龙江以北、乌苏里江以东 100 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纳入沙俄版图。至此,西起外贝加尔、东至太平洋、北至北冰洋、南到黑龙江和乌苏里江流域,形成了广袤的俄国远东地区,与中国东北形成了漫长的边界线。从此以后,除按条约规定留居原地的中国居民之外,到这里来谋生的中国人已不再是“季节性移民”,而是出国赴俄打工者或称旅俄华工。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一支多达数十万的旅俄华工队伍,来往于中俄边境,劳作生活于俄国远东的深山老林、荒凉矿山和广阔田地里。这支队伍作为俄国远东劳动力市场的特殊商品,成为远东资本积累的工具,且对毗邻两国边境地区的经济发展和政治生活产生过重大影响。本书就是着重分析和叙述了这支华工队伍赴俄的历史背景、历史原因、规模及其在远东地区的生活形态、经

济状态、社会组织形式等等,并较客观地评价了华工对远东经济发展所起的巨大作用。作者利用大量中外历史文献、官方统计资料及历史学家、边境旅行者的有关著述(有些为鲜为人知或首次披露),旁征博引,科学地论述了旅俄华工的这一历史现象。

本编对于我们研究当时中俄两国政府的边疆政策、华工对中俄两国边境地区政治、经济、社会的影响,研究远东地区中俄关系史、东北边疆史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对于今天我们如何在中俄两国边境地区开展经贸合作和发展经济,也能起到历史借鉴的作用。

然而作者在中俄关系问题的某些方面仍沿用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苏联史学界的一些错误观点,例如:书中把中国东北称为“满洲”,将清朝政府称为“满洲当局”,认为黑龙江流域不属中国领土,“不归清政府管辖”等等。为保持该书原貌,本译书对原书观点和提法未作删节,全部照译。

原稿涉及俄国远东和中国东北地区的地名很多,译者尽可能查对中国史书中所用历史地名,极个别无法查到的,采用译音方法,并加注说明。

对文中引用的中文史料,一律按俄文照译,并以脚注形式附部分原文,以资对照。

在核查史料过程中得到辛培林、张凤鸣等同志的帮助和指导,谨此致谢。

本编由王晶翻译,宋嗣喜校对。

《阿穆尔沿岸地区的中国人》是B. B. 格拉韦所著。20世纪初,为了对远东地区的黄种人(主要是中国人)的“威胁”和对这一地区的开发提出对策,沙俄政府向黑龙江地区派出了所谓由各方面的专家和“所有有关部门的特派人员”组成的考察队。之后,形成了多卷专门考察报告。沙俄政府外交部的特派员B. 格拉韦是这一庞大考察队的成员之一,其主要任务是考察黑龙江沿岸地区的黄种人问题。他向沙俄政府提交的报告为《阿穆尔沿岸地区的中国人、朝鲜人、日本人》。本书只是节译了他的这篇报告中的有关中国人的一部分,因此名之为《阿穆尔沿岸地区的中国人》。

这篇报告距今虽已近一个世纪,但对远东地区中俄关系史及边疆史的研究仍有重要参考价值。报告附有各类图表,译者只择有关主要内容译出。

本编由张宗海翻译,赵立枝校对。

CONTENTS

目 录

►俄罗斯远东的中国人

第一编 资本主义时代旅俄华工在远东

引 言	2
19 世纪下半叶华工赴俄国远东的历史条件	9
俄罗斯移民迁居远东及对远东的经济开发	9
满洲——俄国远东华工的主要供应地	17
俄国远东的华工数目及其法律地位	32
华工从事的主要行业	43
华 工	43
华人的商业和企业活动	50
华人农民	57
华人的副业生产	59
华工的社会生活与日常生活	69
华人社团	73
华人医疗机构、娱乐场所和邮政业务	79
红 胡 子	83
华商和企业主对当地居民的剥削	87
华人的日常生活和风俗	89
结 语	95
附 录	97

附录一 1910 年俄华工人在阿穆尔省和滨海省的分布情况	97
附录二 1911 年阿穆尔省和滨海省国营和私营企业中的俄华工人数目	100
附录三 1910 年滨海省和阿穆尔省俄华商企业的数目	101
附录四 华人企业及其流动资金情况	102
附录五 乌苏里边区华人村《公共管理法规》	104
附录六 伊曼河谷华人“公议会”法规	106
附录七 公共守则——《同鉴录》	110
缩 略 表	112
部分中国面积、重量及货币单位表	112
书目索引	113
人名索引	126
地名索引	129

第二编 阿穆尔沿岸地区的中国人

序	140
引 言	143
居住在阿穆尔沿岸地区的中国人的历史概况	146
中国人迁居边区的原因	148
中国人流入边区的方式	149
中国人数的统计	152
关于中国人居住边区的俄国法令	162
中国人从事的行业	166
第一类:	166
中国人的工商业	166
中国庄稼人	178
中国人的近海航运	178
中国仆役	182
第二类:	184
中国工人——苦力	184
俄国工人和中国工人的劳动能力的比较	185

俄国工人同中国工人的工资比较	187
中国工人和俄国工人需求的比较	187
私营企业中的中国工人	190
金矿中的中国人	191
国家工程中的中国人	199
铺设阿穆尔铁路的工人问题	201
1910 年 6 月 21 日法令	206
将俄国工人输入到边区的措施	209
黄种人流向俄国引起的俄国人向西方的迁居	211
第二类:	217
居无定所的中国人及红胡子	217
中国人的种族特点	221
中国人的社团	222
结义誓约	225
中国人社团的管理	228
中国人的合法社团	229
中国人与俄国人的通婚	230
中国人的邮政、住所、戏院和烟馆	232
中国人的邮政	232
中国人的住所	232
中国人的戏园和烟馆	234
划定中国人居住区的必要性	238
附 表	241
附表一 中国人留居外贝加尔省的综合数字(1910 年 9 月 1 日前)	
.....	241
附表二 中国人留居阿穆尔省的综合数字(1910 年 9 月 1 日前) ..	242
附表三 中国人留居滨海省的综合数字(1910 年 9 月前)	243
附表四 中俄各类经商者数字	244
人名译名索引	245
地名译名索引	246
民族名译名对照表	248

第一编

资本主义时代旅俄华工在远东 (1861—1917)

引 言

打工——是由于自然经济解体、资本主义社会关系形成和发展而出现的社会历史现象。这一现象在 19 世纪后半叶至 20 世纪初叶的中国广泛流行。

中国的打工现象形成于中国本土及其边陲地区，其中包括满洲^①。中国打工族来自中国社会最底层，主要是贫穷农民——佃农和半佃农、破产的手工业者和小商人，他们在家乡靠自营经济已无法谋生，被迫流落外省或国外去打工。

华工于 19 世纪中叶出现在俄国远东地区。当时俄国人开始加紧开发边区：兴建城镇，铺路架线，修筑港口，建立地方工业和农业。这一时期边区劳动力严重不足。从俄罗斯内地省份输送劳动力不仅费用昂贵，且时间漫长。而当时在毗邻的中国正有大批破产农民找不到营生，忍饥挨饿。在俄罗斯远东能谋到工作的消息很快传遍中国东北与内地。于是，华工结帮成伙或单枪匹马地涌向滨海地区和阿穆尔沿岸地区^②。他们不带家口，对劳动和生活条件毫无苛求。因此私营企业主很愿意雇用他们，况且华工的报酬比俄国工人要低。正如列宁指出的：“……‘文明’国家的剥削者总是利用外国工人毫无权利这一点。”[见书目 1，第 371 页]

华工的职业多种多样。他们大多数没有专业技术，只能当力工使用，后来又涌入了小商人、个体手工业者、菜农、渔猎者、手工淘金者和挖参人；很多人从事捕鱼、捞海参、捉蟹和软体动物。在海上捕捞者中间最多的是捞海带的人。

^① 指中国东北。——译者注

^② 指黑龙江地区。黑龙江，满语称“萨哈连乌拉”，达斡尔语称“卡拉穆尔”。俄国人最初在黑龙江两岸碰到的是达斡尔人，从达斡尔人那里知道了这个称呼，于是便将黑龙江称作“阿穆尔”。——译者注

华工既有经俄国驻华代办处招募有组织地前来边区的，也有自发地单独行动的。他们从海路经符拉迪沃斯托克^①进入边区，有的通过满洲铁路。在俄国远东的华工是人数众多的，其成员每隔三、五年就有变动——一些人来了，另一些人则回中国和满洲老家了。华工的流动正像他们在边区的活动一样，俄国当局无力控制。俄国当局长期以来对中国人在俄国领土上居留未予重视，认为这是暂时的局部现象。然而当滨海地区和阿穆尔沿岸地区华人的数目达到几十万的时候，政府不得不着手研究这一问题。所谓的“黄种人问题”甚至拿到第四届国家杜马（议会）中讨论。1912年5月杜马中的劳动者党团提出建议“保护俄国工人在远东同中国工人的竞争力”。对此1912年5月10日布尔什维克报纸《真理报》发表文章指出：“在现代经济生活发展的情况下，工人从一国向另一国流动的现象是经常发生的。如果贫困将满足于最低劳动条件的中国无产者驱赶到阿穆尔地区的话，那么俄国工人能不能以及应不应该阻止他们到那里去呢？不能，俄国工人的希望只有一个，即希望中国工人跟他们一样发动起来，共同进行反对资本家的斗争。为此，道路只有一条，把俄、中工人联合到共同组织中来。”总之，进步的舆论界同情来俄的华人，并意识到，是极度的贫穷迫使他们背井离乡，漂泊异国，为的只是挣钱糊口。

第一批关于阿穆尔沿岸和滨海地区外来中国人的报道出现在19世纪中叶。进行这些报道的是俄罗斯著名的远东问题研究者：1855年对边区进行研究的植物学家К. И. 马克西莫维奇；1858年对乌苏里江及其毗邻地区进行地形测绘的测绘学家М. И. 韦纽科夫；1859—1861年间对滨海地区的动物与植物区系进行研究的自然科学家Р. К. 马克；1867—1869年间留居滨海省的学者和杰出旅行家Н. М. 普尔热瓦利斯基。自然科学家К. И. 马克西莫维奇和Р. К. 马克将其主要注意力用于专题科学论述，只是在个别地方提到中国人，而且未作具体叙述[见书目80]。М. И. 韦纽科夫和Н. М. 普尔热瓦利斯基根据其研究性质，经常同边区的当地居民交往，对土著居民的生活条件、经

① 即中国东北古城海参崴，因盛产海参而得名，位于绥芬河口海湾东岸。1860年6月沙俄军强行侵占该地，建立军事哨所，易名“符拉迪沃斯托克”，意为“控制东方”。同年11月中俄《北京条约》签订后，正式被沙俄割占。今为俄滨海边疆区首府，太平洋港口，西伯利亚大铁路之终点。——译者注

济活动、风俗习惯进行研究。他们将其所见所闻，在日记和著作中作了精彩的描述。他们对乌苏里江沿岸中国人的研究得出了非常有价值的结论。其中有 M. И. 韦纽科夫所作的论断，他说：“中国移居者之所以居留乌苏里地区要么是逃避法律追究，要么是企图靠土著居民并通过挖采人参而发财致富。这是一些来自乌苏里江上游、勒富勒河^①（泽尔卡利纳亚河^②——作者）和伏锦河（巴甫洛夫卡河——作者）的躲避清朝通缉的逃亡者。”[见书目 66，第 86—88 页]他指出：“中国人不带家眷，只身在这里生活，其中有些人与鄂伦春女人结了婚。一些人种庄稼，另一些人挖人参和打猎，第三种人则用十分低的价格或用些小摆设从当地居民那里收购或换取土特产品。”[见书目 66，第 86—88 页]

H. M. 普尔热瓦利斯基在乌苏里边区居留近三年时间。他在这段时间里搜集了有关边区状况及其居民的极其丰富而有趣的资料，其中包括关于中国人的资料。他将中国人分成从满洲逃过来的流放犯人和临时来这里“喜欢过野性而自由生活的人”[见书目 101，第 78—87 页]。H. M. 普尔热瓦利斯基是 1868 年在阿斯科利德岛金矿干活的华工起义的目击者。^③

俄国行政当局对远东地区华工状况的研究是从 19 世纪 70 年代末开始的。1879 年东西伯利亚总管理局长官维斯列诺夫对生活在南乌苏里地区的华人首次进行了人口普查，并对所获得的数据进行分析，撰写出一部概要[见书目 36，第 2 分册]。普查由一人按中国人的住房路线进行调查。有关住在房子里的中国人的资料，是根据当时在场者的口述记入普查簿中的。一些房子里住着 20 多个华人，由在场的一人或几人回答问题，因此对那些不在场的人往往不能提供准确的资料。尽管如此，维斯列诺夫对南乌苏里边区中国人的人口普查，就实质而言，是 1879 年以前对该地区华工研究的最初的文献资料。

1881 年，对按《璦琿条约》（1858 年）的条款规定而居住在阿穆尔河左岸的中国人的状况进行了调查。调查结果全部收集在总参谋部 Г. И. 纳扎

①② 即大柞树河，今称泽尔卡利纳亚河，河面平静如镜之意。——译者注

③ 阿斯科利德岛原名青岛，位于海参崴东南 50 余公里的海面上，是南乌苏里地区的著名产金地。此处指青岛淘金工人的一次大规模抗俄斗争。——译者注

罗夫中校和阿穆尔省督军巴拉诺夫少将的公务札记中〔见书目36,第1分册〕。札记不仅包括统计数据,而且还有民族学方面的资料。这些文件揭示了俄国行政当局和居住在阿穆尔省的中国居民间的相互关系,这些华人往往无视俄国当局的指令〔见书目36,第1分册;书目16〕。

19世纪80年代出版了И.П. 纳达罗夫有关滨海省中国人的著作〔见书目85—92〕。他研究的主要区域是其曾经居住过的乌苏里边区。他在著作中指出了在俄国远东地区居留的华工的临时性质,描绘了滨海地区的中国人所从事的主要行业类型,同时也未忘记对外来者的社会生活、风俗习惯的描述。他的著作是这一问题研究的新的阶段。

1912年出版了B.B. 戈拉韦的著作《阿穆尔沿岸地区的中国人、朝鲜人和日本人》^①〔见书目16〕。实际上这是描述滨海省、阿穆尔省和部分赤塔省的中国打工者的第一部著作。尽管所有问题阐述得极其简略,仅仅是一些统计报告数据,然而对于俄罗斯远东地区的打工工人的状况却提供了一个相当完整的概念。打工现象被视为同边区经济发展有关的现象。这部著作反映了俄国政府对华工问题的官方观点。如果说政府在某种程度上曾经限制利用华工,尤其是在国营企业和阿穆尔省的铁路建设事业上,而在某些情况下曾禁止雇用华工,那么个体企业则要求不要限制中国工人进入边区。个体经济中富裕农民同样使用华工,他们支持企业主。因此限制雇用中国人的行政措施很少奏效。

戈拉韦的著作含有珍贵的事实材料,但是应当指出,其中错误地叙述了中国人在俄罗斯远东地区居留的历史。这显然可以解释为,边区的历史尚处于初步研究阶段,阿穆尔沿岸地区和滨海地区最初居民的许多问题尚未阐述清楚。

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俄罗斯一些具有沙文主义情绪的知识分子中间流传着俄国远东地区的“黄祸论”。这一论调曾得到沙皇政府的某种支持。出版界出现了许多文章,甚至有个别专题论著,作者在其中论证了威胁俄罗斯远东的“汉化”的危险性〔见书目76、书目99、书目116〕。这些文章和

^① B.B. 戈拉韦,沙皇政府外交部特派员,曾奉命调查黑龙江、乌苏里江地区所谓“黄种人问题”,此处所指著作是其向沙皇政府提交的考察报告。——译者注

专题论著提出这样的思想，即中国人会同化远东为数不多的俄国居民，俄罗斯将逐渐失去其在边区的影响，他们提出要求，立即禁止华人进入阿穆尔省和滨海省境内。“黄祸论”的传播者试图把边区居民的劳动阶层吸引到自己这一边来，向他们灌输说，因中国工人竞争劳动市场而使俄国工人的生活条件变坏。他们号召劳动人民反对中国人进入俄罗斯。这种宣传分化了在反对企业主剥削斗争中的俄国工人和中国工人，阻碍了劳动群众为争取切身权利而建立斗争的统一战线。

当时中央和地方一些报纸上出现了关于在南乌苏里地区的中国红胡子的文章，把红胡子现象说成是流浪漂泊的中国人对边区俄罗斯居民搞的恐怖主义行动。文章作者有意渲染红胡子对俄国村落居民的迫害事件。红胡子现象被描绘成必须惩治的普遍祸害。发表这种文章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激起边区俄罗斯居民对中国劳工的憎恨，强化驱赶他们离开边区的斗争 [见书目 17、书目 127、书目 91、书目 101]。

但是，也有文章客观地反映了华工于 1870—1894 年间在阿穆尔省金矿 [见书目 105]、在乌苏里铁路建设上 [见书目 171] 以及在远东其他经济领域内的劳动情况 [见书目 51、书目 110、书目 112 等]。

1897 年俄罗斯进行过一次全国性的人口普查。C. 帕特卡诺夫分析了俄国远东的普查资料，并查阅了早些时候的统计数据，指明华工的数目和他们在边区的地理分布 [见书目 62、书目 32]。尽管对华人的普查数据无疑不够完整（普查是在居民点进行的，而许多从事副业的中国人，居住在原始森林里），然而 C. 帕特卡诺夫的著作仍不失为研究这一问题的珍贵文献。

如果不提及 B. K. 阿尔谢尼耶夫^①的著作——该人写有多部关于滨海地区中国人的民族学著作——那么关于在革命前一段时间内对华工研究的历史便是不完整的。B. K. 阿尔谢尼耶夫写道，据当地人证实，中国人出现在边区，不早于划界前 10—15 年。这是一些从满洲逃来的流放犯，他们隐居这里，躲避满洲当局的追捕。他指出，中国人并不是乌苏里边区的定居者，而

^① B. K. 阿尔谢尼耶夫，俄国军官，地理学会会员，东方学会会员，曾任哈巴罗夫斯克博物馆馆长、俄国地理学会阿穆尔分会会长，是苏俄远东考察家，有多部考察著作。今俄国滨海边疆区阿尔谢尼耶夫市是以其姓名命名。——译者注

是临时居留的外来人，其成分总在变换 [见书目 52—56]。B. K. 阿尔谢尼耶夫关于乌苏里边区中国人的著作描绘出一幅比其前辈更加完整的图画，但仍存在不少缺陷。其中包括在研究中国地名学时，在解释很多中国地理名称方面，存在不少错误，未揭示出这些地名后来的变化。尽管存在这些不足，B. K. 阿尔谢尼耶夫的著作在对乌苏里边区华工的研究方面向前迈出了新的一步。他试图认真总结所积累的关于华工的知识，对于下一步研究提出了一系列新的问题。

苏联学者对该问题的研究始于 20 世纪 60 年代，由苏联科学院远东分院发起。

20 世纪 70 年代，本书作者曾发表文章和专著 [见书目 108、书目 109]，其中引用文献资料证明，苏联远东的中国地名并非自古就有。它们是边区划归俄罗斯版图之后才在这里出现，而且并非是由中国老居民命名，而是在滨海地区和阿穆尔沿岸地区的俄罗斯人进行经济开发之初来这里的华工给起的名字。

1973 年 B. M. 卡布赞出版了题为《远东是如何变得人烟稠密的》[见书目 75] 一书，书中也涉及到中国人居留俄罗斯远东的问题。但是书中有一些纰漏。比如，作者断言：“由于从中国内陆来满洲的移民明显不足，中国当局下令临时居住在南乌苏里边区的中国居民于 1883 年春天以前移居到吉林省境内。”[见书目 73，第 90 页] 事实上，当时从中国内陆移居到满洲的移民是足够多的。只是由于在同俄国的边境上形成紧张的局势，清政府决定将本国居民紧急迁移到与俄罗斯接壤的满洲边境地区，因为这些人非常熟悉俄国远东地区情况，一旦中国同俄国发生战事，他们可能成为清政府军队的向导。为此目的，还在边境地区新建了中国军屯，把从俄罗斯远东回来的中国人安排定居在那里 [见书目 8，目录 1，卷宗 236，第 1—25 页；又见书目 5，目录 190，卷宗 392]。卡布赞还有一个说法也无法苟同，即 19 世纪 70 年代，南乌苏里边区中国居民成分发生了质的变化，表现在“临时性的、季节性的中国工人数量在缩小、同时捕猎者、挖参者等人数也在减少，而定居的中国移民数目却在增加”[见书目 75，第 70 页]。当然，的确是发生了变化，但不是通过“增加定居的中国移民”，因为从来未有过把中国人迁往俄罗斯远东这样的事情。恰恰相反，从 19 世纪 60 年代开始，当往这一边区迁

移人口的时候，那些为了种菜而随意占据公有土地的中国人被从所占据的地方赶走 [见书目 8，目录 1，卷宗 236，第 1—25 页；书目 5，目录 190，卷宗 391]。边区中国居民成份的变化，恰恰是以定居的中国住户缩小，前来乌苏里边区谋生的工人数量增加的方式发生的。不过，就整体而言，B. M. 卡布赞的这一著作包含了一些有关这一问题的重要资料。

俄罗斯远东华工问题，在研究远东社会经济发展和 17 世纪至 20 世纪初俄中关系的苏联历史学家的一些重大著作中也有涉及 [参阅书目 20、书目 21、书目 75、书目 108、书目 110]。

在一些苏联作者的著作中都明显地、论据充分地证明，资本主义时代俄国远东华工的打工现象是整个历史进程发展的产物。由于俄国同中国签订了《璦琿条约》、《天津条约》和《北京条约》，远东地区的俄中关系得到稳定，一方面有利于向俄罗斯远东移民，及对远东的开发；另一方面也有利于满洲。但是俄国远东地区经济发展的速度超过了从内地省份迁移农民的速度。劳动力不足是各经济部门雇用华工的主要原因。

据我们所知，中国历史文献中尚未见到研究这一题目的专著。然而国民党的一些作者，乃至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些历史学家于六七十年代曾试图利用 19 世纪下半叶至 20 世纪前几十年间，中国人曾居留俄国远东这一事实（同时还有其他一些论据，苏联学者曾指出这些论据毫无说服力。例如，参见 Г. В. 麦利霍夫、Е. Л. 别斯普罗兹万内赫的著作），作为向苏联提出领土要求的依据。

本书的写作目的是全面分析中国打工现象在俄国远东地区产生的原因和性质，华工的社会成分和地理分布，他们所从事的主要行业类型以及他们日常生活和社会生活的某些方面。

19 世纪下半叶华工赴俄国远东的历史条件

俄罗斯移民迁居远东及对远东的经济开发

根据 1858 年《璦琿条约》和 1860 年《北京条约》，阿穆尔沿岸地区和滨海地区先后并入俄罗斯版图。俄国政府面临着开发远东边疆的任务。这是一个长期而又复杂的过程。需要大量资金，而俄国政府无从筹措。此外，在农奴制和农奴制废除后仍保持着农奴制残余的情况下，向远东大规模迁移农民是不可能的。列宁指出：“在俄国，移民问题是属于有关国家的土地问题。19 世纪末，摆在我们面前两个选择：或是彻底废除农奴制，那将保证快速地广泛地发展我们的边区；或是拖延内地的土地问题，从而不可避免地使发展生产力和移民工作长久地停滞不前，使农奴制度得以保持下去。”[见书目 2，第 70—71 页]

1858 年制定了向阿穆尔沿岸地区移民的优惠条件。愿意迁移远东的农民可摆脱农奴的依附地位。但是，这一措施与沙皇俄国的地主农奴制度实质相矛盾，因此未能实现。与强制迁移哥萨克、受惩戒的士兵和流放者的同时，只允许国有农民自费或公费迁移。

向阿穆尔沿岸地区的移民进行得十分缓慢。对于移民来说迁移意味着要经受极大的艰难困苦。比如，1859 年春，愿意迁居阿穆尔沿岸地区的 290 户居民，仅有 230 户勉强到达，分别安置在哈巴罗夫斯克^①和索菲斯克之间的

^① 即中国古城伯力。在黑龙江与乌苏里江会口东岸。1858 年沙俄强行在此建军事哨所，并以 17 世纪中叶侵入黑龙江流域的头领哈巴罗夫为名。1860 年沙俄根据不平等的《北京条约》将此地割占。1880 年正式设市，称哈巴罗夫卡，1893 年改用哈巴罗夫斯克。——译者注

阿穆尔沿岸，有 17 户在外贝加尔过冬，1861 年才到达阿穆尔 [见书目 8，目录 1，卷宗 236，第 3—25 页]。往乌苏里江右岸移民开始于 1858 年，140 户哥萨克和内卫军退役的士兵家庭从外贝加尔来到乌苏里地区，他们建了 3 个哥萨克村镇：科尔萨科沃、卡扎凯维奇和涅维尔斯科耶。第二年春季，这些人分别迁到乌苏里江上游，又建立了 12 个新居民点 [见书目 8，目录 1，卷宗 236，第 3—25 页]。1858 年还建立了几个阿穆尔哥萨克军乌苏里步兵营的村镇：上米哈伊洛夫斯卡亚镇、公爵镇^①、伯爵镇等 [见书目 114，第 56 页]。1859 年，K. Ф. 布多戈夫斯基的乌苏里探险队在与满洲交界处的兴凯湖^②建立了命名为图里罗格^③的军事哨所。1860 年，第三边防营的 2 个连由哈巴罗夫卡抵达滨海地区。他们在波西耶特、拉兹多利诺耶、尼科利斯科耶、乌格洛沃耶及其他地方建立了许多军事哨所 [见书目 106，第 4—5 页]。同年，第四边防营第三连的士兵乘“满洲人”号运输舰在金角湾登陆，建立了符拉迪沃斯托克军事哨所 [见书目 15，第 18 页]。与此同时，强制外贝加尔哥萨克和士兵迁往阿穆尔河。1862 年前，迁入阿穆尔哥萨克军防区 16403 人 [见书目 8，目录 1，卷宗 236，第 3—25 页]。1896 年阿穆尔省已有 67 个哥萨克镇，人口达 13200 人，还有 41 个村镇，人口为 9486 人；布拉戈维申斯克^④的居民为 3344 人。阿穆尔省土著居民人数 2700 人。他们均为俄罗斯居民。此外，按照《璦琿条约》的条款，阿穆尔河左岸还有几千清朝居民留在原地居住。在滨海省共有 88 个村落，居民有 19361 人，其中 1450 人为朝鲜人。此外，这里还住着 8760 名土著居民 [见书目 70，第 34、38、56 页]。

1861 年关于农民迁入滨海地区和阿穆尔沿岸地区的法律生效初期，远东的移民人数每年都在 1000 人至 1500 人之间浮动。根据 1861 年的优惠条件迁

① 原称丘普罗瓦镇。——译者注

② 兴凯湖，位于黑龙江省东部，现为中俄界湖。——译者注

③ 图里罗格，亦作都里洛格。——译者注

④ 布拉戈维申斯克，即黑龙江北岸中国重镇海兰泡，位于黑河市对岸。一说“海兰”是蒙语黑色的音转，意为“黑色的泡子”；一说“海兰泡”是满语“榆树下之家”之意。1856 年沙俄哥萨克军强行在此设立哨所，并命名为“布拉戈维申斯克”，意为“报喜城”。1858 年 5 月中俄《璦琿条约》签订后，该地连同黑龙江以北大片中国领土被沙俄割占。——译者注